

新感受·名家新作

读人札记

江曾培
著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江 曾 培 著
读 人 札 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8 字数 140 千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069-2/I·801

定价:12.50 元



1991年5月，向钱君匋(中)祝寿



1995年6月，与黄宗英(右)、秦怡(中)在小风车茶社



1996年9月，与席慕蓉在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与杨澜在淀山湖上



1998年春，向巴老介绍由他题写校名的“上海文艺
石关希望小学”的建筑图



1994年4月，与柯灵在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1991年5月，与许杰(左)、赵超构(中)在一起



1992年5月，与王元化在座谈会上

目 录

忆总理	(1)
文化老人话老年	(4)
巴老的书桌	(9)
春愁黯黯悼赵师	(13)
冯牧的理论勇气	(18)
葛洛的“拔俗姿”	(22)
才高气清的柯灵	(25)
沉潜 in 思辨海洋中的王元化	(31)
荒煤、徐迟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37)
营造“苏州园林”的陆文夫	(45)
“樱榴居”主鲁彦周	(50)
“地狱天堂索艺珠”的赵丹	(56)
罗竹风：杂文界的一杆旗	(59)
编辑大家赵家璧	(65)
呼喊“苍天在上”的陆天明	(72)
龙应台印象	(78)
初识席慕蓉	(83)
“长身玉立，书气迎人”的杨澜	(87)

一身璀璨的钱君匋	(94)
司马攻:泰华微型小说的开拓者	(99)
怀念黎鹤凌	(104)
瞻仰吴敬梓纪念馆	(106)
谒茅盾故居	(112)
访徐志摩墓	(116)
王国维故居探“谜”	(120)
在梵高、伦勃朗的画前	(124)
林肯纪念堂前的遐思	(128)
寻访歌德故居	(133)
黄宗英冯亦代喜得“宁馨儿”	(139)
王蒙的“访苏心潮”	(142)
尹明华的“美国新观察”	(144)
严歌苓的“多愁善感”	(147)
殷慧芬的“欲望”	(149)
余纯顺的“壮士中华行”	(152)
俞天白的“当代英雄”	(155)
孙泽敏的“安有警报器的采访车”	(158)

邱士龙的“儿戏”.....	(161)
戚雅仙的“三多”.....	(165)
莫扎特与《伤仲永》.....	(167)
“边缘人物”张元济.....	(169)
倪墨炎笔下的周作人.....	(171)
苦难造就刘海粟.....	(176)
全面认识伍尔夫.....	(178)
愿劳伦斯“名副其实”.....	(181)
佼佼《李斯特》.....	(183)
“朝拜贝多芬”.....	(185)
韩英的微型小说.....	(187)
就《危楼记事》致李国文.....	(191)
文豪的嗜好.....	(196)
跋.....	(199)

忆总理

周总理在我们心中，既是高山仰止的伟人，又是平易近人的亲人。

早年，我在新民晚报作记者，有幸与总理有过几次接触。1956秋或1957年春，总理在上海参加一个座谈会。与会者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会场是由几张条桌围成的一个长四方形。总理走入会场，绕桌与大家一一握手。与会者多数是总理的老朋友，不用介绍，就亲切地寒暄起来。当总理走到新民晚报社社长面前，社长自我介绍说：“我，赵超构”。总理紧握他的手用力抖了几抖，笑着说：“认识，认识，主席说过你是宋高宗的哥哥。”宋高宗名赵构，赵“超”构，自然是他的哥哥了。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哄然一笑。会场气氛更加亲切轻松。总理接着说：“你写的《延安一月》，很好嘛！”《延安一月》，系赵超构先生于抗战期间到延安采访后，回重庆写的一部纪实性作品，先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后出了单行本，生动地介绍了解放区情况，传播了真实的信息，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总理明察这一切，记住这一切，使赵超构先生与在座者都很受感动。

总理坐下以后，请大家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

表意见。然后，他讲了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总理如数家珍似地讲了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一系列数字，钢、铁、棉、粮、油、煤……1949年产量是多少，现在是多少，要力争达到多少。总理讲时，没带一片稿纸，一连串数字如清泉般地连绵不断地徐徐涌出。这自然体现了总理惊人的记忆力，更表明了总理当时的心已紧紧贴在国家的建设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有关情况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总理讲了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讲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一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这些，给与会者以很大鼓舞。

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见到总理。接着不久，在一次招待外宾的晚宴上，我又见到总理。宴会是在友谊电影院的大厅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先生也出席了宴会。按要求，第二天的报纸上，要发一张宋副委员长与外宾祝酒的照片。摄影记者一时疏忽，未能及时抓拍到，又不便于请宋副委员长再站起来举杯，急得团团转。善于体贴别人的总理感觉到了，遂站起来，邀请宋副委员长一道再一次干杯。摄影记者由此解了难，油然而生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激与敬意。

1957年4月下旬，苏联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到上海访问。上海组织的欢迎群众形成了“十里长街”。媒体无疑也特别重视。记得伏罗希洛夫是4月23日下午2时左右飞抵龙华机场的。按照晚报的常规，当天只能发个预告。这样新闻性就差些。为了把预告性新闻变成已经发生的新闻，我在写这条消息时，动了一点脑筋，把开头的导语变成了正在进行式，大意是：亲爱的读者，当您拿到今天的晚报时，伏罗希洛夫主

席的专机已降落龙华机场，他正向欢迎人群走去……（因手头无当年报纸，不能如实抄录）。为充实这条新闻的材料，我上午就去“十里长街”和龙华机场采访欢迎群众。想不到中午过后，我在龙华机场惊喜地看到总理在和一些欢迎群众交谈。我们几个记者也围上去。总理问我们是哪几家报纸的。我们一一回答后，总理笑着点点头。直到伏罗希洛夫专机即将降落时，总理才离开欢迎的群众，与从候机厅内走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前去准备迎接。总理常和群众在一起。

1964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来中国访问。总理陪她到上海。恰逢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丈夫、已故总理班达拉奈克先生的诞辰纪念，要在玉佛寺中做佛事。我们几个记者事先想，总理会不会去呢？去吧，参加一套诵经祈祷、拜忏礼佛仪式，似不大适合；不去吧，又似失礼仪。当天一早，我们就赶到玉佛寺采访。佛事在进行。总理没有来。但当佛事即将结束、尚未结束之际，总理到了。他对着班达拉奈克先生的遗像深深鞠了一个躬，以示纪念之意。随后，即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作下一站的参观。我们为总理这种又去又不去的恰当处理暗暗叫绝。这里，让我们感受到的，也正是既原则，又灵活；既大仁，又大智；既令人高山仰止，又使人倍觉可亲。

1998年3月5日，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日

文化老人话老年

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一场骤雨，洗刷了盛夏的几分炎热。上海的几位文化老人，来到丁香花园小聚。丁香花园树木浓密，绿草成茵，有着“空翠湿人衣”的意境，是上海老人消夏纳凉的好去处。

先到的是82岁的新民晚报社社长、杂文家赵超构。他自30年代投身报界以来，杂文创作长期不辍，被称为“杂文界之最”。50年代开始，他以林放的笔名，在《新民晚报》上设《未晚谭》专栏，几乎每日一篇。“文革”中，被迫辍笔。80年代后，他老店重开，仍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重新“放”起来。他的文章入情入理，刚柔相济，深入浅出，微言大义，深受各阶层读者的广泛欢迎。许多读者看《新民晚报》，首先是看《未晚谭》。近年来文章更加成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有人赞之曰：“林放文章老更成”。但是，有谁知道，这位杂文大家现在是挂着心脏起搏器在坚持写作的。“文革”前，我在他领导的《新民晚报》工作过，我们同仁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老将”。这天，一见面，我说：“老将，近来身体好吗？”他说：“还好，只是两腿乏力，不能多走路了。”我一看，果然在他的身旁，多了一根竹节拐杖。但他精

神仍很健朗，谈起目前杂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杂文家有坐“冷板凳”的寂寞，他说，写杂文的人，既要不甘寂寞，又要甘于寂寞。说不甘寂寞，是看到世态人情，有感即发，破一破周围的沉寂空气；说甘于寂寞，是要有准备坐好“冷板凳”的心态，“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他说，这就是写作杂文的应有情绪。实际上，这也正是他这位杂文大家的情绪与性格。

接着，83岁的散文家、电影剧作家柯灵，在夫人陈国容的陪同下到了。柯灵的道德文章，一向为我所崇敬，他最近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序言，赢得了海内外的普遍好评。为了写好这一序言，他认真阅读了散文卷里180家的365篇作品，计120万字，还查阅了当年60多种散文集。初稿写成后，自己不满意，决定推倒重来。为此，他又重点研读了何其芳、周作人、钱钟书、梁实秋等人的散文集，并参考了有关文学史的著作，终以深沉的历史眼光与当代的审美意识，创作了这一见解不凡而又情文并茂的序文。全文仅8000多字，柯灵为它花去了三个多月时间，其间放弃了三次外出开会与视察的机会。对比当前文坛上那种粗制滥造、马虎草率的风气，柯灵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实在值得大大发扬。柯灵多年前就在酝酿创作《上海一百年》长篇小说，但因零星求稿者不断，致使他的长篇迟迟未能动笔。为了减少他的外界干扰，我们出版社曾想为他安排一个僻静的写作地方，但他觉得自己能解决，就不要麻烦出版社。我们知道他经济条件并不富裕，长篇上手后别的东西写得少了，会影响收入，因而在去年上半年，我们为《上海一百年》开了一点预支稿费送去，他却婉拒了。他说：“我

感谢出版社的关心，但我的书稿还未写出，能不能写好还难说，这个钱现在不能拿。”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在受到“一切向钱看”的歪风污染的文坛，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我曾上海的一次文艺座谈会提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今天见面，我还是敦请他及早集中精力写《上海一百年》。我说：“这个有意义的作品，只有你能写得出，我们等待着，读者等待着。”他笑嘻嘻地说：“好呵，好呵！”不过，我想，为了这位老人能集中精力完成这部巨著，让我们尽量减少对他的干扰吧。

随后，82岁的作家罗洪，80岁的翻译家朱雯，75岁的编辑家范泉，76岁的出版家丁景唐，以及85岁的作家施蛰存等，都先后来了。施蛰存以编辑30年代的《现代》著名，被称为“现代”派作家的代表，实际上他学贯中外古今，既撰写现代小说，又研究古典文学，既搞作品，又事翻译。前几年他曾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身体甚好，话音响亮，语多幽默风趣，他一来，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当丁景唐谈及上海文艺出版社拟编辑一本《文化老人话老年》的图书时，他乐开了，说《西塞罗文集》中有一篇《论老年》，是一篇著名散文。不过，西塞罗只活到63岁。他论老年，恐怕只是一个五六十岁人的体会，在今天看来，这还不算老年。真正要写出老年人的思想、情绪、经验、体会，恐怕还是他们这批七老八十的人。他说，提起老年，往往想到晚年。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画等号。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还没有死，这年龄叫晚年。如果离死去还甚远，即使七老八十，也不能说是他的晚年。他说，他第一次退休，是在1975年，工宣队送他回家，祝颂他晚年愉快。他心里好笑，你以为我过两三年就死了吗？

到今天，16年过去了，他还活着，有这么长期的晚年吗？现在的青年人，经常以晚年安乐祝颂老年人，却不知道老年人心里难受。这不是祝颂，简直是诅咒他快死呵。

是的，老年人并不是都进入了晚年。政清人和，长寿的人越来越多。不少跨入老年的人，离晚年还远呢。坐在施蛰存旁边的许杰，91岁了，是当今上海年龄最大的作家。他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惨雾》，茅盾赞之为“一篇杰出的作品”。现在尽管年届耄耋，犹壮心不已。他赋诗道：“默默耕耘辛垦地，殷殷切则自由天。晚来识得人生味，归咏春风大有年。”“晚来识得人生味”，老年人有着自己特有的人生体验，“归咏春风大有年”，老年人有着自己不辍的追求；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特别是对这些著名的文化老人，人类的智者，正如几千年前的管仲所说，“老马之智可用也”。

说着，说着，施蛰存像被蜜蜂螫了似的，右手抓住助听器尽甩，最后把它摔在桌上，摇头叹息。原来，他的助听器失灵，变成了聋子。柯灵很快地把自己的助听器借给他使用。他听了一会还是摇头，说产品同样没有“过关”。由此大家议论起对老人的用品，往往粗制滥造，漫不经心。就说助听器吧，质量常有问题，有的音量不清，有的又特别敏感，自己打个喷嚏，能放大成一个响雷，把自己吓了一跳。而且不时会坏，坏了又不大有地方修，使失聪的老人很苦恼。就像施蛰存，刚刚滔滔不绝，谈笑风生，但与外界的声音联系一旦切断，他就“顿失滔滔”，神情变得木然。有人建议同样带有助听器的林放为此事在报上“放一放”，林放说：“老人用品利润不高，放了，也不一定马上有用。”

但是，大家说还是要“放”。目前，全世界高龄人口不断增加。按联合国规定，老年人占人口百分之七以上的国家称为“老年型国家”。上海老年人口已占百分之十四，早属于老年型城市。如何关心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解决他们的一些特殊需要，实在是要全社会加强重视的。就这些文化老人来说，他们的思维都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少有“老”态，这可能与他们长年用脑有关。他们的老态较多地表现在腿上、眼上、耳上、牙上，能不能在这方面多用点力，帮助他们克服年老所带来的困难，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那种对社会来说不可或缺的“余热”。

1991年8月